



上海市學術著作出版基金

袁枚年譜新編

鄭 幸 著



上海世紀出版集團



上海市學術著作出版基金

袁枚年譜新編

鄭 幸 著

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袁枚年譜新編 / 鄭幸著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1. 10

ISBN 978 - 7 - 5325 - 6109 - 4

I. ①袁… II. ①鄭… III. ①袁枚(1716 ~ 1793) - 年譜 IV. ①K825.6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1)第 215450 號

袁枚年譜新編

鄭 幸 著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常熟新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635 × 965 1/16 印張 47 插頁 4 字數 610,000

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 - 2,300

ISBN 978—7—5325—6109—4

K · 1445 定價: 9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系

序

上世紀九十年代末，業師章培恒先生主編的《中國文學史新著》初版上中兩冊已經付梓，下冊的撰稿工作隨即展開。我承命撰寫袁枚部分，章先生當時給我的指示，一如既往，還是那句“要有點新東西”。

我理解先生所謂的“新東西”，不僅指新觀點，更是指新材料。于是一頭扎進上海圖書館，把那裏的古籍卡片箱翻了個遍。結果還真在普通本古籍目錄裏找到了個“新東西”，就是那部被學界誤認為已經失傳的袁枚早期單刻別集——乾隆本《雙柳軒詩文集》。

當時王英志先生主編的《袁枚全集》標點本已經出版，為學界研讀袁枚作品提供了很大的便利。我之認識袁枚，也受惠其書頗多。但是當我把《雙柳軒詩文集》和《袁枚全集》相關部分校勘時，發現相同的詩文，《全集》本文字多有更改，而另一些作品，則為全集所未收。我把這一情況報告給了章先生，先生除了指示我把這一新發現的單刻本情況寫進文學史新著稿中，還支持我用標準的古籍整理方式，以《雙柳軒詩文集》為主要素材，對《袁枚全集》作一校補。整理工作完成後，他又在很短的時間內，在他主編的《中國文學研究》集刊上，全文發表了這篇長達七萬字的《袁枚全集校補》。

二十一世紀初葉，文史學界已經開始流行後現代，古籍整理成果《袁枚全集校補》毫無反響，是意料之中的事。我則因為參加《中國文學史新著》撰寫之後，對文獻學之于文學史研究的重要性有切膚的痛感，所以不久就將研究的重點轉向了更為基礎性的版本目錄學。不過

袁枚的別集，無論是作為文學史還是文獻學的個案，偶爾仍會浮上心頭。

2006 年秋，我第一次招收到了一位文學文獻學方向的古文獻博士生，就是來自浙江大學的鄭幸。她是著名的清代文學專家朱則杰教授的高足，碩士論文做的是清代杭州西泠印社創始人丁敬的文學與交游，在清代之文學和文獻研究兩方面均有很好的潛質。我則因為上述因緣，跟袁枚作品留下了一段尚未割捨的瓜葛。因此大半年後當她和我商討博士論文選題時，袁枚成了我們共同認可的最佳選擇。而最終確定其文獻學博士論文的形式，是以一種新的視角重編一部袁枚年譜。

鄭幸具有作為文獻學專業優秀學生的天然素質，其對於文獻搜輯的熱忱和材料排比的敏捷，一般同學難以望其項背。數月之內，她就在袁枚別集之外，發現了一批前此未被人注意的相關史料，並有所撰述。但我總期待，她的博士論文除了比前人的同類著述有更多更詳細的資料，最好還能在方法上有所創新。所以在上課之餘，時常會有意無意地和她談起袁枚別集的文本版本問題，希望在新編的袁枚年譜中，能細緻地區分、利用袁枚別集的前後不同版本，以展現那位清代聞人也許更為真切的個人發達史。但是文獻學實在不是一種能夠“談”出來的學問。所以到了 2007 年的夏天，我想何不利用《袁枚全集校補》的材料，自己寫一篇論文，談談清代別集中的單刻和全集關係問題，既可作為個人研究袁枚的一個小結，也提供給鄭幸作為學術研究理念上的一個參考。論文最初在復旦召開的“現代視野下的中國古代文學與文論國際學術研討會”上宣讀，繼蒙中山大學吳承學教授引薦，修改後發表在《中山大學學報》上，就是那篇相對而言有點反響的《從單刻到全集：被粉飾的才子文本——〈雙柳軒詩文集〉、〈袁枚全集〉校讀札記》。

我想鄭幸是在重編袁枚年譜的極其繁重的工作中，逐漸領會我所期待的方法創新的。但是一旦領會，她會作出比自己的老師更出色的成果。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《袁枚年譜新編》，就是在她的同名

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經過修訂完成的新著。如她自己在前言中所述，這樣的年譜撰寫方式，“實際上是對古人（尤其是古代著名作家）年譜編纂方式的一種全新嘗試”。“這裏強調的，已不再是‘全集’或靜態層面上所呈現的單一作家形象，而是試圖通過對單刻別集和晚年全集、初刻本與增刻本的比較，以及大量其他非自述性材料的輔助，來揭示這些著名作家成名前後的微妙變化，從而呈現一個更具歷時性、更真實、更全面的作家形象。”全書是否如願達到了這樣的效果，尚待讀者的評判。但是作者的不懈努力與散布在書中的扎實的考訂成果，無疑是值得肯定的。

最後我要特別指出的是，《袁枚年譜新編》能够以目前的面貌出版，還應當感謝清代文學研究大家劉永翔、張寅彭、蔣寅先生的關注與支持，感謝袁枚研究專家王英志先生在博士論文明審時給予的中肯批評。尤其感謝博士論文答辯時嚴佐之、楊明、胡曉明、陳先行、錢振民諸教授對作者的循循善誘式的指導，其中的許多真知灼見，令作為導師的我都受益匪淺；也讓我有仿佛已回到往昔，正重聽章培恒師講課似的神游快感。

陳正宏

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六日

前 言

袁枚(1716~1798),字子才,號存齋、簡齋,晚號隨園老人,浙江錢塘(今杭州)人。此公的一生,可謂清代文壇上的一段傳奇。少年時才華橫溢,早登科場。甫至中年,即辭官不仕,寓居南京小倉山麓之隨園,專心創作,苦心經營,同時遍交海內士人,廣納隨園弟子,至晚年遂成為乾嘉文壇首屈一指的領袖人物。其所標舉的“性靈”論,上承晚明公安三袁之餘緒,下啓近代個性解放之思潮,在清代文學史乃至思想史上均有着不容忽視的重要影響。

如此醒目的文壇地位,使後人對袁枚的生平、詩論、思想等各方面情況都產生濃厚的興趣,並不斷加以研究。其中與生平研究相關的,主要是三部袁枚年譜,即同治間方濬師編《隨園先生年譜》、民國間楊鴻烈撰《袁枚評傳》第二章“年譜”以及今人傅毓衡編《袁枚年譜》。其中方譜率先對袁枚重大生平事件作了基本編年,有開創之功,然而過於簡略。楊譜引入“五四”新思想,觀點鮮明,見解獨到,然而評論略多,考述則相對較少。傅譜敘事最為詳盡,對袁枚若干重大生平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,是目前學界利用最多的袁枚年譜;但限於當時條件,也存在不少詩文繫年失誤、文獻徵引面狹窄等問題。此外,尚有一些雖非側重於繫年但亦涉及袁枚生平的成果,如周本淳點校本《小倉山房詩文集》、王英志點校本《袁枚全集》,均以文獻整理的方式對袁枚別集情況作了探究,也為學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;另如顧遠薌《隨園詩說的研究》第一章所附袁枚大事年表、王英志《袁枚評傳》中涉及袁

枚生平活動的部分章節、羅以民《子才子：袁枚傳》、王標《城市知識分子的社會形態——袁枚及其交遊網絡的研究》等，以及若干考訂袁枚交遊個案的單篇論文，均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

—

相對於層出不窮、不斷深入的袁枚文學思想研究而言^①，袁枚的生平研究似乎略顯邊緣，并未受到學界的太多重視。這裏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，即袁枚本人已借助《小倉山房詩文全集》、《隨園詩話》等個人著述，以作品編年及文字敘述的形式，對自己一生的行迹作了相當充分的交待。後人在此基礎上生發描述、反復勾勒，不斷形成豐富的文獻史料，并最终給人一種事實明晰、別無疑異的印象。再加上三部袁枚年譜及其他研究著述的勾勒，似乎已足以達成一種共識，即袁枚生平已經相當明晰，并無太多疑點。

然而，隨着早年單刻別集《雙柳軒詩文集》的重新發現，一些被長期忽視的文獻學問題開始引起我們的關注。提出這些問題的，首先是我的導師陳正宏先生。他不僅是《雙柳軒詩文集》的發現者與整理者，更在《從單刻到全集：被粉飾的才子文本——〈雙柳軒詩文集〉、〈袁枚全集〉校讀札記》一文中指出，袁枚曾以刪改、潤飾等方式，有意識地修訂其早年詩文，而這一現象無疑有着深遠的文獻學意義^②。在陳師的指引下，我沿着這一思路前行，通過搜輯其他早期材料，以及對晚年全集系統中幾部增刻本的深入校勘，逐步認識到袁枚在其一生中，幾乎不間斷地以重編全集、剝改舊作等手段對自己的作品進行修訂。這些修訂，或改善了藝術上的生澀，或實現了生平上的粉飾，但都對我們解

① 相關研究綜述可參考石玲《袁枚研究的回顧與思考》（見《蘭州大學學報》1999年第2期）、汪龍麟《20世紀後20年袁枚研究述評》（見《蘇州大學學報》2005年第1期）。

② 參正宏師《從單刻到全集：被粉飾的才子文本——〈雙柳軒詩文集〉、〈袁枚全集〉校讀札記》，《中山大學學報》社會科學版，2008年第1期。

讀袁枚造成了一定的影響。

中國傳統文人在晚年編纂個人全集時，都會考慮對自己的舊作進行不同程度的刪改。即使由於亡故無法親自篩選，其代刊者也往往會在篇目上作一定的取舍。這意味着我們所見到的古代作家全集，通常並不能完整地呈現作家的全部創作歷程，還有很多真實存在過的創作瞬間，被這樣一種自覺性的篩選行為過濾掉，甚至替換掉。因此，當對比《雙柳軒詩文集》這一早期別集與《小倉山房詩文全集》這一晚年全集中的相關作品時，我們驚訝地發現，袁枚對自己早年的詩文作品作過如此大幅度的加工潤色，後來出現在全集本中相應時期、相應內容的詩文作品，幾乎全部經過修訂。與此同時，記載着這些早年詩文的《雙柳軒詩文集》，却被袁枚本人毀板，逐漸銷聲匿跡。取而代之的，是鋪天蓋地的《小倉山房詩文全集》。

這一作家別集版本系統中普遍存在的單刻本與全集本的關係問題，提醒我們，如果僅在“全集”基礎上探討作家在個人面貌、創作風格等方面的演變情況，就會不自覺地陷入看似動態、實則靜態的研究誤區。而由此所得到的結論，與實際存在過的史實，也必然具有一定差異。就這一層面而言，部分早期單刻別集的存在，至少在一定範圍內保存了某些更具歷時性的創作面貌。利用這樣一些單刻別集，不僅有助於進一步還原作家早年的真實面貌，而且有助於反映其思想、創作的變化過程，從而打破僅憑全集所勾勒的“完整”形象。

與此相類似的，是另一個在版本學領域內受到關注，卻很少運用到作家個案研究上的問題。這就是以不斷增刻的方式完成的作品集，在增刻的同時，往往會對原有版片進行剝改甚至重刻，從而引起前後文字變化的情況。當這些剝改、重刻之舉發生在作家生前，且並非因修正版刻訛誤或版片損壞的時候，這一現象就更顯得耐人尋味。

就袁枚的幾部重要著述而言，如《小倉山房詩集》、《小倉山房文集》、《隨園詩話》等，都存在這種有意識的剝改、重刻現象。以隨園自刻《小倉山房詩集》為例，筆者所經眼者，即有二十卷本、三十二卷補遺

一卷本、三十四卷補遺二卷本以及三十六卷補遺二卷本。其中二十卷本當屬初刻本，其餘三種均為增刻本。諸本除卷數差異外，文本內容也存在程度不一的變化。有些是個別字句的剝改，如卷一八《代琴書答》末句，二十卷本作“神爵三年買奴券，袖中擎出淚如絲”，三十二卷補遺一卷本作“僮約思量父某某，低頭莫怪出門遲”，至三十四卷補遺二卷本則作“交代兒家諸火伴，婆娑莫怪出門遲”。有些卻涉及數葉十餘首詩作的重刻，如二十卷本卷五凡二十二葉，增刻本不僅重刻了三葉（新增詩歌十一題十八首），還將相關的頁碼全部剝改。這些改動，不僅涉及藝術上的修飾、潤色，也對作家生平考訂發生了影響，值得推敲。

在同樣以增刻方式完成的《隨園詩話》中，筆者也發現了類似的甚至是更複雜的現象。《隨園詩話》初刻於乾隆五十五年，隨後又屢次增刻，並不斷對前面已刻的版片進行剝改、修訂。而在全本增刻完畢之前，已出現了根據初刻本（或修版較少的早期刻本）重刻的坊刻本。當初刻本在今天已難覓蹤跡的時候，這些坊刻本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初刻本的面貌。而通過校勘這些早期坊刻本、歷次增修本，我們再次看到了不少有意識的文字改動。或是個別字句上的修改，或是整個條目的增刪，讀來別有意味。

上述文獻學現象，無論是刪改早年作品，還是修訂晚年作品，多少都體現了一種追求完美的心理傾向。這裏的“完美”，既包括藝術上的成熟圓融、觀點上的無懈可擊，也包括個人經歷上的毫無瑕疵。就袁枚而言，他通過刪改作品文字、銷毀單刻別集這些舉動，既緩和了自己創作起步階段的青澀和粗糙，也淡化了自己面對仕途起伏時的茫然和彷徨，更修正了一些未成熟的文學思想。修改後的作品文字，呈現出袁枚成熟時期才華橫溢、灑脫不羈的完美姿態，然而這與當時的實際情況，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移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上述追求完美的心理傾向，並不僅僅表現在刪改詩作、剝改版片這種直觀的、可視的文獻學現象上。還有一些非直觀

性的因而也更具迷惑性的表現，干擾着我們的視線。這就是作家本人通過有選擇、有側重的敘述，對某些並不為人熟知的生平事蹟，作一定的調整和更改。在袁枚身上，即表現為對一些足資榮耀的事件反復強調，同時對一些有損聲名的過往閉口不提。更為複雜的是，這種情況還會發生反復。例如鄂爾泰“留飯”一事（參乾隆七年譜），袁枚曾在《詩集》卷五《哭鄂文端公》、《文集》卷八《武英殿大學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》、《詩話補遺》卷八第三五則中先後提及。有趣的是，在二十卷本《詩集》中，《哭鄂文端公》一詩原有題注曰“事載《文集·行略》”，此注在增刻時被剝去，但當增刻至三十六卷時，又於詩末增刻新的注語曰“公賜饌小紅園”。就直觀印象而言，首先《行略》一文被淡化了（這或許與袁枚喜歡擅自撰寫碑傳文有關^①），而“留飯”一事卻得到了強化。若進一步推究，此事似又透露出袁枚對待鄂爾泰態度的微妙轉變，即從最初的極欲宣揚，到不欲宣揚，再到極欲宣揚（儘管此時宣揚的重點已然不同）。無論如何理解，就袁枚變換不定的自述而言，如過於相信他的文字，顯然會造成一定的誤導。

在通常的理解中，作者本人的敘述總是比較可靠的第一手材料。因此，當袁枚在晚年以追憶的形式，頻繁回顧自己的成長歷程，並對其中某些片段津津樂道、反復稱說的時候，是很容易給人一種事實確鑿的印象的。然而結合一定的文獻證據考察後，會發現這種自述與事實的偏離。這說明，過分依賴作者本人的敘述，勢必會不自覺地受到作者的引導，從而使研究朝着他所期望的方向推進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袁枚生平研究的難點，已不在於史料稀缺所導致的作家面目模糊的狀況，而在於袁枚的自我敘述太豐富、太明晰、太具有導向性，容易令研究者迷失方向。

因此，如何剔除多餘的粉飾，儘量還原一個真實的、變化着的袁

^① 彭蘊章《歸樸齋叢稿》卷二《王惕甫先生獨立圖讚》序提及彭啓豐歿時“袁簡齋自以門下士撰神道碑至，二林公却之”。又據彭啓豐《芝庭先生集》卷末彭紹升跋，袁枚自撰事實有之，而“二林公卻之”則不盡然。參乾隆四十九年譜。

枚，就成為袁枚生平研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。從這個角度看，已有的三部袁枚年譜，不僅局限於袁枚自己的著述，而且完全依賴其晚年編定的《小倉山房詩文全集》，這就難免會存在缺乏歷時性、囿於單一視角等方面的缺憾。因此，重編一部袁枚年譜，以更加全面、動態地反映袁枚變化多端的一生，仍然顯得必要。

此外，對中國傳統文人而言，詩文（尤其是詩歌）除去文學藝術屬性，似亦有“日記”、“個人史”等屬性。古人擅長這種抒情性的、詩性的敘事，並把自己的日常生活、思想感情以一種特定的、藝術的形式表達出來。這是“以詩證史”得以實行的前提之一，也是年譜、年表類著述大量使用作者詩文的原因之一。蔣士銓《石蘭詩傳》即云：“古人編年載詩後，人得考訂以為年譜，因得詳其事業游跡，尚論而思慕之，是詩即可為作者本傳。”^①極其明確地指出了詩文作品的敘事屬性。而在有清一代，作家別集中的敘事性色彩似尤為明顯。許多作家別集中存在大量以紀行、遊覽為內容的作品，不少甚至以專集的形式結集刊行，如王士禎《蜀道集》、《南海集》、《雍益集》，陳文述《岱遊集》等，不勝枚舉。此外，詩人亦動輒將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搬入詩中，如落齒、脫髮、近視、病癰等等，可謂巨細不遺。詩歌發展到清代，其題材選擇已越來越傾向於記錄、描述個人生活，且其手法亦漸趨具體和寫實。故今人蔣寅將“紀實和敘事”視為清代文學的一大特點，確是頗有見地的^②。

然而詩畢竟無法完全等同於史。不僅因為詩人多半沒有嚴格的歷史意識，還在於詩或藝術的本質是要超越生活的。完全寫實的詩歌，多半會被批判毫無詩味。那麼，若回到生平研究的問題上來，詩文（或其他自述性文字）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作家的生平思想面貌？尤其是當作家有意識地粉飾個人經歷的時候，或是其自述材料占主導性比例且又難以找到其他佐證的時候？我們對袁枚這一典型案例的

① 見《忠雅堂文集》卷五。

② 參《清代文學的特徵、分期及歷史地位》一文，見《清代文學論稿》，鳳凰出版社2009年。

討論，或許正可以作為解答這個問題的一種嘗試。

有鑒於此，本年譜在利用袁枚自述文字時，尤其注重其文字的前後版本差異，並儘可能搜輯、利用其早期詩文、集外作品，力求在史料的歷時性上獲得一些突破。同時，本年譜也通過爬梳、整理大量前人未曾涉足的文獻史料，來對袁枚的社會交遊、文學活動等作大量補充。在豐富材料的同時，也避免了袁枚自述性文字的過多干擾。通過上述努力，或可略補已有三譜在研究視野、材料廣度等方面的缺憾。

二

在討論了作家作品用於生平考訂時的複雜現象後，我們或可通過對比前後詩文的異同，體味細節文字的增刪，掌握更多自述材料之外的新材料，來重新審視袁枚。以下即為筆者在新的文獻基礎上對袁枚的一些主要理解。

袁枚在少年時頗為心高氣傲，入學後更與書院諸師友相抗，不僅得到萬松書院山長楊繩武意味深長的評價，還曾遭到府學教授蘇滋恢的排斥（參雍正十一、十二年譜）。屢赴鄉試不第後，二十一歲的袁枚前往廣西投奔叔父，主要目的當為覓館謀生，卻幸運地獲得了薦舉博學鴻詞的機會。這段經歷在其詩文中屢被提及，主要著墨於金鉉的賞識與薦舉，令人印象深刻。然而今讀《雙柳軒詩集》及《詞科掌錄》中所收的當時詩作，我們感受更多的卻是他遠赴廣西時那種淒惶無助之感（參乾隆元年條）。難怪《隨園詩話》開篇第一條即云“古英雄未遇時，都無大志”，或亦袁枚當年的真實寫照？

袁枚在京師生活了七年，前四年以坐館為生，所結交者以中下層文士為主，如胡天遊、周大樞、萬光泰等，間亦與李重華、杭世駿等文壇前輩過從。客觀地講，袁枚其時雖有才名，但在人才濟濟的京師，並未受到額外關注。我們今天讀到的有關這段經歷的記載，多出自袁枚自述而非他人之口，即可見一斑。但透過“才子”的光環，我們仍能體會

到當年袁枚試圖把握自己命運的良苦用心。乾隆三年春，爲了求取功名，袁枚忍痛割愛，半年不作詩，不作古文，不觀古書，專心鑽研時文之學，最終鄉會聯捷，並入選庶常。之所以對這一點加意指出，是因爲後人在評價袁枚時，多注重其任性不羈的一面，卻忽視其在選擇人生道路上的慎重和嚴肅。袁枚在晚年論及對待科名的態度時曾云：

然僕之棄作文戒俗氣，亦戒有鄉野氣。無科名，則不能登朝；不登朝，則不能親近海內之英豪，受切磋而廣聞見；不出仕，則不能歷山川之奇，審物產之變，所爲文章不過見貌自臧已耳，以甕牖語人已耳。^①

二十歲的袁枚，或許不見得即有此等見識。他自己也坦承，當時正處於“齒漸壯，家貧，兩親皤然，前望徑絕”^②的巨大壓力之下。但這種積極的姿態、化被動爲主動的處事方式，卻是一以貫之的。在其後一些重要的人生節點上，袁枚均表現出對自己人生道路非凡的把握能力，以及與之相應的執行能力。在筆者看來，這才是他任情肆意的一生中，真正的筋骨所在。

乾隆七年，袁枚因散館試滿文不合格，被外放江南。這與此前三年縱情聲色的庶常生活，想必不無關聯。而這一外放原由，也曾一度被諱莫如深地從詩集中刪去（參乾隆七年譜）。袁枚當年的沮喪可想而知，雖然他晚年極力淡化這一點，我們仍然能從《雙柳軒詩集》與《小倉山房詩集》的對比中找到痕跡。從“西笑長安天上客，幾回雲裏覓雙魚”到“手折芙蓉下人世，不知人世竟何如”^③，從“吹動關山羌笛冷，騷人哀怨起天涯”到“從古傾城好顏色，幾枝零落在天涯”^④，《雙柳軒詩

① 見《文集》卷三五《與備之秀才第二書》。

② 見《文集》卷三五《與備之秀才第二書》。

③ 分別見《雙柳軒詩集·都門留別》其三、《詩集》卷三《改官白下留別諸同年》其三。

④ 分別見《雙柳軒詩集·落花》其一、《詩集》卷三《落花》其一。

集》中彌漫的哀傷寂寞之感，在《小倉山房詩集》中被轉化為一種瀟灑不羈之氣。這些改動典型地揭示了袁枚晚年對自己早年行跡的控制慾望，比單純的毀版、刪詩更具迷惑性。後人論及袁枚外放，多引上述諸詩，難免無從捉摸其微妙之處。

袁枚任知縣六年有餘，期間飽受風塵下吏之苦，並不愉快。惟一的契機是乾隆八年尹繼善出任兩江總督，袁枚得從沭陽移官江寧，又得薦牧高郵，仕途似漸趨明朗。然而薦舉之事終未果，尹繼善亦於乾隆十三年改官兩廣，仕途遂再遭挫折。再加上欠徵案、修志案及以往種種壓力（參乾隆十二、十三年譜），袁枚最終於乾隆十三年乞病辭官。關於袁枚辭官的原因，後人討論頗多，筆者亦多所補充。然而拋開新發掘的材料不談，即使在利用舊有文獻時，歷時性問題仍然值得注意。如增刻本《詩集》卷五所補入的十餘首詩歌，主要作於乾隆十一年至十二年，卻被有意無意地插入到乾隆十三年袁枚辭官之際所作之《挂冠》與《解組歸隨園》之間。此舉不僅修訂了個別詩作（如《送尹宮保移督廣州》六首），也打亂了卷五原有的編年次序。而從版刻情況看，增刻者已非原來的刻工，這說明增刻之舉至少相隔有年。這些詩歌最初的缺省，是無意漏刻，亦或有意不刻，我們均已不得而知。惟這種反復增刪的情況，在《詩集》、《文集》、《詩話》等重要著述中均屢見不鮮。當這種改動涉及辭官等關鍵事件時，文獻的歷時性問題就尤為重要。

袁枚在乞病四年後，於乾隆十七年再次出仕，半年後因父喪戛然而止。此事袁枚著墨不多，後人亦多未重視。然而筆者以為，此番出仕、再辭或較前番更耐人尋味。其出仕前所作《雜詩八首》其四^①曾云：

入山愁我貧，出山愁我身。我貧猶自可，所愁戚與親。我身猶自可，所愁吏與民。出處難自擇，請以詢家人。父母聞作官，勸行語諄諄。妻妾聞作官，膏我新車輪。僮僕聞作官，執鞭追後塵。

^① 見《詩集》卷七。

我意獨不然，亦非慕隱淪。朝來見縣令，三十鬚如銀。勞苦未得息，大吏猶怒嗔。況我挂其冠，此骨已嶙峋。從前後行船，已據要路津。而我復重來，相見殊逡巡。所恨年齒少，衆論猶紛紜。婦少難守節，日長難關門。掩耳且捉鼻，痛飲求昏昏。

此詩至少說明以下幾個問題：

第一，袁枚再仕與其時經濟壓力有關。按袁枚早在乾隆四年就與淮南鹽商程氏交遊，後放貸投資鹽業以獲利。《尺牘》卷一《與程原衡》有“僕數年來，仗昆玉之轉輸，爲全家之生計，所以終養老親、辭官不赴者，道此長城可恃耳”之語，可知其經濟上對程氏之倚重。此外，至晚在乾隆十六年已置田滁州，以爲固產。從此詩看，其時袁枚的經濟尚未穩定，故需以俸祿養家。後隨着投資的逐漸獲利，及潤筆、饋贈、刷賣全集、交易古玩等其他收入的增長，袁枚的家產亦漸見豐厚。又據《遺囑》，袁枚臨終前資產近三萬，這已遠非一般殷實之戶可比。

第二，家人（尤其是父親袁濱）曾給予一定壓力。所謂“父母聞作官，勸行語諄諄。妻妾聞作官，膏我新車輪”，所謂“家居三年，太夫人病痊，贈公以先生年未四十，催令起官”^①，袁枚在家中顯然孤立無援。而其徹底放棄出仕，亦與該年袁濱去世有關。聯繫《雙柳軒詩集》中悄悄刪去的“學爲四子文，逼迫窘嚴父”^②，以及袁枚初官時袁濱暗訪政績之舉（參乾隆七年譜），我們不難推斷袁濱教子之嚴及其給予袁枚的不小壓力。今《文集》中有袁母行狀，《續同人集》有盧文弨祭袁母文，而述及其父者則付闕如，這多少是令人好奇的（參乾隆十七年譜）。

第三，袁枚在其人生道路的抉擇上，亦曾掙扎猶豫，極度迷茫痛苦。詩中既有回首官宦生涯的記憶猶新，又有展望仕途前程的舉棋不定，更有面對流言議論的滿腹苦悶。這與袁枚晚年瀟灑不羈、進退從

① 見吳貽詠《福行簡齋公傳》，收入《慈溪竹江袁氏宗譜》卷一八“列傳正編”。

② 見《雙柳軒詩集·途中寄金二質夫七十六韻兼呈諸同年》。

容的形象，多少有些出入。這一階段的袁枚，勢必是焦慮而彷徨的。袁枚對此不願着墨太多，卻反復強調乾隆十三年辭官之舉，也就不難理解了。然而正是這一段焦慮彷徨，及隱藏在背後的對自我、對人生的深刻反思，使袁枚走出了“出處難自擇”的困擾，進一步將人生的主動權把握在自己手中。

從乾隆十八年起，袁枚就基本開始了以市隱為出處、以名山為事業的職業文人生活。這種極其“現代”的生活方式，在傳統社會中簡直聞所未聞，袁枚卻實現得如此順理成章。從個人的角度看，這基於其對自我性情的清醒認知：厭惡束縛，嚮往自由；至情至性，熱愛生活。袁枚首先是個詩人，有着非比尋常的詩性氣質；其次才是文壇領袖或理論家。他似乎總有令人驚歎的旺盛精力，投入於聲色冶遊，但其根本之驅動，仍是一種似乎“過度”了的“情”。通覽《詩集》，涉“情”之作最多。或手足，或師友，或子女，或姬妾，無不絮絮切切，款款深情。世人對袁枚尋春、狎妓之舉頗多指摘，即不稱之為名教罪人，亦頗視為有傷大雅。前有朱珪諄諄勸誡，後有章學誠破口大罵；即到今天，又有多少人肯正視其事而不腹誹兩句的？然而筆者在排比其一生後，不免感歎，袁枚在用情上的“過度”，正是其一生行事、創作的基礎。這種“過度”源於袁枚天生具有、後天縱容的強烈情感和慾望，並以矯枉過正的姿態去觸犯既有的道德準則，其破壞性可想而知。然而，沒有如此強烈的“情”，就沒有袁枚，更遑論“性靈論”，它們是一體而不容割裂的。

當然，袁枚亦擁有足夠的理性和睿智去把握自己的人生，因此其放縱而過度的情，首先建立在自我肯定之上。正如其在回覆朱珪的書信中所言：“惟其無所愧於心，是以無所擇於口。風流自賞，言過其實，惟恐人不知。”^①顯然，這種自我肯定也許經歷過反復的質疑和反省，但最終是嚴肅而不容置疑的。其思考的過程和結果，最後以“性靈論”的形式表達出來。今之研究者對“性靈”的核心是“情”已基本達成共識，

① 見《小倉山房尺牘》卷九《答朱石君尚書》。